



为了能让二姐看见外面的世界，母亲把她的床挪到了靠门的地方。门外是土路，上学的小孩跑过去，下地的大人走过来。二姐就这样趴着，看春去秋来，看孩童奔跑，看人间烟火……

门外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向玉玲



我家那扇木门，那些年从没锁过。不是不锁，是没必要。二姐常年趴在床上，锁给谁看呢？

二姐出事那年，我七岁，她十二岁。之前的事我记不太清了，只记得她跑起来的样子。田埂那么窄，她端着碗也能稳稳地跑过去，辫子在后脑勺一颠一颠的。妈妈说，四个孩子里数她腿脚最轻快。

一 禁锢的时光

那是一场再普通不过的咳嗽感冒。父亲牵着她的手，去了村头的小诊所。当时流感盛行，医生忙得脚不沾地，就让二十出头却没有行医资格的女儿代为操作打针。一针落在二姐的屁股上，起初并不疼，只留下一阵莫名的麻木。回家的小路上，二姐的脚步越来越沉，走着走着，她腿一软，缓缓蹲在地上，仰起脸看着父亲，声音轻得发颤：“爸爸，我腿软。”

父亲没有想太多，蹲下来背着她就往家走，一路走一路歇。二姐趴在他背上，一声没吭。到家后放床上休息，二姐就再没下来过。经诊断，原来是打针伤到了坐骨神经，二姐的下半身彻底失去了知觉。

医生提了两斤冰糖来到家里，把父亲拉到一角：“都是亲戚，三代以上的老亲了，算起来还是一家。孩子这事，真是对不住，对不住……”父亲坐在门槛上，低着头抽烟，一口接一口，烟雾模糊了脸。他不接话，也不看医生，就那么蹲着，像一截枯树桩。母亲靠着门框，半倚着身子，指头一下一下抠着门框上的木刺。她不说话，一直望着门前那条土路，望着土路尽头灰蒙蒙的天。医生站了一会儿，把冰糖放在石缸边，讪讪地走了。

那袋冰糖后来被母亲拿进门来，放在二姐的枕头边。从夏天放到冬天，最后硬成一块，没人吃。

父母没有放弃。天还没亮，父亲就背起二姐出门。山路不好走，穿过庄稼小路，走好远才赶上大巴车。他们去过乡卫生院，去过县城，去过万州，听过偏方，捉过癞蛤蟆来敷腿。每一次都是满怀希望而去，满身疲惫而归，归来的还有那双孔越变越大的北京胶鞋。夜里起身，我常看见他一个人坐在门槛上，也不点灯，抽着烟，火头一明一灭，照出他躬着的身子。我想叫他，张了张嘴，没叫出来。

后来，父亲不再带着二姐往外跑了。为了能让二姐看见外面的世界，母亲把她的床挪到了靠门的地方。虽说是床，其实是竹凉床。她趴的地方被汗浸得发红发亮，身子挨着的那几块竹片磨得日渐光滑。拿手摸一下，滑滑的，凉凉的。

门外是土路，晴天过灰，雨天过泥。上学的小孩跑过去，下地的大人走过来。二姐就这样趴着，下巴搁在手背上，看了一年又一年。

她只能趴着，腰以下动不了，翻身都要人帮忙。下半身毫无知觉，拉屎拉尿都不知道。母亲每天都要掀开被子，轻轻地慢慢地把她挪到床的另一边，抽出湿了、脏了的褥子，再换条干净的。

此时，二姐把脸侧过去，看着门外。换完了，母亲说“好了”，她才转过来，轻轻“嗯”一声。这套动作到后来母亲只需要几分钟，只是轻了又轻，仿佛怕碰碎了眼前这抹单薄的生机。

那时，我正读二年级。每天放学，到门外的路边就大喊着：“二姐，二姐！”声音穿过那扇门，她轻快地应着：“回来了？”她抬起头，笑一下。

走到床边，二姐接过我的书包，翻看着，看看今天的书和昨天有什么不一样。她从书包里抽出一本作文集，翻阅着。指尖划过书页，眼里满是向往，这书成了二姐门外的世界。而二姐的校园生活，被定格在了五年级。我也偶尔带回来她班上同学和老师写给她的信，一遍遍读给她听。

我趴在床边开始写字，一边讲起学校的事。她听着，眼睛亮亮的，偶尔接一句：“然后呢？”我讲了好一会，她默不做声。转过头，发现她正呆呆地看着门外。门外几个女孩正跳着皮筋，辫子甩来甩去。我停下来，她也没发觉，就那么看着，眼神里的光一点点暗下去。过了一会，她收回眼神，“你接着说。”

我没说，我不知道说哪儿了。后来我也跑出去了，在那条她曾跑过的田埂上拼命地跑。现在我想，我那时跑那么快干什么？我又不是她。可我停不下来，仿佛这样就能替她跑过那些被禁锢的时光。

二 委屈与恐惧

那几年，二姐的身子愈发弱了。大腿内侧老长水泡，透明的那种，薄得发亮，一碰就破。她没有痛觉，水泡破了、烂了，自己也不知道。母亲换褥子时看见了，用棉签蘸着药水，轻轻点上去，手却忍不住发抖。擦完了，母亲站着看一会儿，才转身去做饭，背对着我们的肩膀，一耸一耸的，哭声被死死憋在喉咙里。母亲大概是看到了二姐逐渐萎缩的腿，看到了那抹生机在一点点消散。

有一回我问二姐：“疼不疼？”她说：“不疼，就是怕吓着你们。”

我读四年级那年，灶台搭在了二姐的床旁边。母亲说，她一个人躺着冷清，看我们做饭有人气儿。铁锅里煮着红薯饭，二姐侧过头听着柴火噼啪的响声，看着母亲切着菜，火苗一窜一窜的，映着她的脸，竟有几分暖意。“妈，放点盐。”“晓得了。”有时候我坐在灶前烧火，她自言自语道：“柴别塞太满，空心才燃得旺。”我试了试，果然。她笑了一下，说：“我聪明吧？”我说：“聪明。”她就又笑了一下。

那年，我已经能一个人跑去镇上。出门前，我站在门口，回头看她一眼。她挥挥手，“早点回来。”那声音，轻得像一片羽毛。

我读初二那年的冬天，一条蛇打破了夜的宁静，也打碎了家里最后一丝安稳。竹凉床一直铺在靠门的地儿。我和二姐各睡一头，那时她已经连抬手的力气都弱了许多。半夜，我被一阵细微的抽泣声唤醒了。打开灯，我看到她脸色发黑，眼角挂着泪花，一只手捂着另一只手的虎口处，身子微微发抖。我定睛一看，竹凉床边沿的竹条上，盘着一



条蛇。青灰色，有大拇指粗。蛇头探进床边二姐的大水杯里，一动不动，正享受着冬日的宁静。二姐的手在离水杯不到一尺的地方僵持着。

我大叫一声，叫来了里屋的爸爸妈妈。我伸手把她的右手往另一边拽，她的指甲重重地掐进我手心，那是她最后的力气。我使劲拽，才把她一点一点拽过来。这时，二姐缓过神，听到了我和爸妈的声音，积攒了八年的委屈与恐惧，终于化作放声大哭。

蛇被父亲夹着扔出去了。母亲口含白酒，一口一口地吸着蛇毒。村里的朴叔也来了，带来了祖传的药酒，说专治蛇毒。二姐眼睛闭着，睫毛一颤一颤的。在朴叔一阵按摩和揉搓中，二姐睁开眼睛，呆看着天花板，大家都不说话，屏住呼吸。第二天，母亲把硫磺粉末撒在一堆柴火上，屋里屋外都熏着，说是驱蛇。可那股刺鼻的味道，却驱不散家里的压抑。

从那以后，二姐愈发沉默了，连看门外的力气都少了。大多时候，她只是闭着眼睛，安静地趴着。

三 熄灭的星火

第二年夏天的傍晚，二姐忽然说：“二妹，周五放学回来帮我买包小冰吧。”声音轻得像一声叹息。那时我读初三，寄读在学校，周末才放假回家，我陪她的时候也渐渐少了。

小冰是那种一角钱一包的甜水，好几种水果味的，在学校门口小卖部有卖。放学，人手一包，咬个角，慢慢嚼，冻成一半冰一半水时味道是最好的。

我愣了一下——那是她趴在床上八年，第一次主动跟我要东西。“想尝尝？”我问。她点点头，眼里闪过一丝微弱的光，像即将熄灭的星火。我赶紧点头：“好。”

周五一放学，我拿着压岁钱小跑着

去小卖部。掏出两角钱，“两包小冰。”“什么味的？”老板问。我愣住了，二姐没说要什么味，红的还是绿的，“一样一个。”我一手攥着一包往家跑。那个时候，我们很少花钱去买零食。跑过田埂的时候，袋子外面开始冒水珠，我怕冰化了，就跑得更快了，耳边的风呼呼响。

快到那扇门时，我大喊着：“二姐！二姐！”喊了两声，却没有听到熟悉的回应。走进屋，安静极了，静得能听到自己的心跳。床头的煤油灯还亮着，凳子上的作文书半翻着，竹凉床上，空了。我呆在原地，手里攥着那两包冰袋，水滴顺着手指缝往下淌，一滴一滴落在地上，比心跳声还要响。

母亲从里屋出来，眼睛红红的，脸上的泪还没干。看见我，张了张嘴，没说出一句话，只是轻轻摇了摇头。我把冰袋放在二姐睡过的枕头上，并排放着，冰袋还带着凉意。可床上，早已没了她的温度。

我愣了一会儿，一直想着我忘了问她想要什么味，我买了两包，二姐一包也没吃上。我转身出去，看见门外有人在晒被子，红的绿的。风吹起来，鼓鼓的，像极了二姐当年甩动的辫子。只是再也没有人趴在门口，看这人间的热闹了。

二姐走了，那年她二十岁。在那张竹凉床上，趴了整整八年。她走的时候，弟弟才两岁，刚学会扶着墙走路，还不懂得什么是离别，只是总歪着头，看着二姐空荡荡的床，咿咿呀呀地喊着“姐姐”。

几个月后，那扇门锁上了。父亲锁的，锁芯扣上的那一刻，发出一声沉重的响。锁完，他蹲在门槛边抽烟，一根接一根，烟雾裹着他，像裹着化不开的悲伤。我有时候也会看看那张床，竹凉床还在，铺盖卷起来了，叠得整整齐齐。母亲把二姐的东西收进箱子，作文书、杂志、算数本，一下一下压平，再一本本码好，动作轻缓，呵护着二姐最后的念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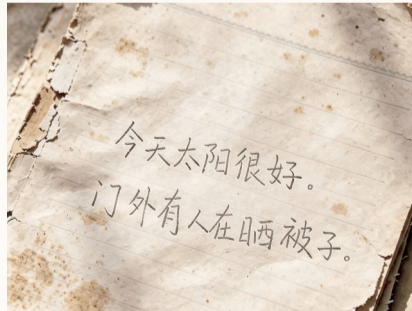
很多年以后，老屋翻新，父亲翻出那个旧箱子。作文书里掉出一张纸条，发着黄，折痕处快要断开了。父亲打开，看了一眼，没说话，递给了我。是二姐的字，用铅笔写的，很轻：

“今天太阳很好。门外有人在晒被子。”就这一句，没有日期，没有署名。门开着，风吹进来，纸条在我手里轻轻抖着。我想起那些年，她趴着，看门外，看了一年又一年。看春去秋来，看孩童奔跑，看人间烟火……这是被困在方寸之间的二姐最温柔的人间念想。可她终究没能走出那扇门，没能亲手摸一摸晒在阳光下的被子，没能尝一口那没化完的甜甜的小冰。

后来，我去了很多地方。看见山，看见海，看见好看的，我就多站一会儿。也看看门外被风吹起的红的绿的被子，总觉得，二姐就趴在那扇门后，看着我，看着这一切。

那张纸条我还留着。偶尔拿出来看一眼，再看一眼。就那一句，那句藏着她八年的期盼，藏着我们一辈子的思念。

如今，弟弟已成年。每到过年回老屋，他总会率先走到村后的山坡上，二姐的坟就在那里，立着一块小小的石碑。他早已记不清二姐的模样，可他总记得，母亲说过，山坡上的那个坟，是他的二姐。他会弄去坟上的杂草，在坟前絮絮叨叨地说：“二姐，我来看看你了。”



二姐的纸条



二姐去世多年后，家里才有一张合影。前左一为作者。（图片由作者提供）